



佛教是在唐朝才傳入中國嗎

羽人主

——與陳非先生商榷

晚飯後，讀一份××晚報，已成了近年來的習慣，我喜愛××晚報，除了那裏有金庸的「神雕俠侶」外，還可以讀陳非先生撰寫的專欄——格調談。格調談是專門講飲講食的，黃霑先生曾在×報周刊的「不文集」中給「格調談」作了一個最佳的註腳：格調也者，「貴夾唔飽」之謂也。香港米貴，居大不易，以有限的稿酬，來應付無限的物價高漲，爬格子動物要塞飽肚子，已經很不容易了。現在不但要吃飽，而且還要有「格調」，放眼整個香港的爬格子界，恐怕只有像陳非先生這樣才有這種能耐，這種福氣！筆者是窮措大一名，當然沒有資格去吃西施血，日月貝，鵝鵝鬆，但讀了陳先生的食經後，也常有畫餅療飢的心理滿足。這就是我愛讀陳先生格調談的唯一原因。

翻開十一月十六日××晚報，流着長長的口水，又準備享用陳先生畫在紙上的餅，但陳先生突然佛興大發，取消了我每晚的眼睛食品，硬塞給讀者和我一具啃不動的「周朝佛像」，以下是摘抄陳先生的一段原文：

「在電台遇到一位老師宿儒，話匣子打開，老人家對電視紀錄片旁白中，有一個『周朝的佛像』，大生感嘆……公開說是周朝的佛像，却未免令人動氣。可惜當時筆者趕着忙，否則大可藉聆教益一番。雖未讀過佛教史，但通常人的印象，佛教是唐朝才傳入我國的，西遊記中就有個唐三藏，玄奘取經後，藏於白馬寺，唐宋八家中的韓愈，上了一本諫迎佛骨表，結果被貶到離天萬里的潮州，佛教之事後於『周』太遠太遠了。……」

不談鵝鵝鬆而談佛像，却未免令人動氣。每份兩毫的××晚報，被陳先生佛興一發，立刻貶值了百份之五十，只值一毫子（起碼在我心目中是如此）。爲了替無辜損失的一角錢不值，決計對陳先生的佛興進行彈劾。

陳先生雖自謙爲「未讀過佛教史」的「普通人」，但他却舉出三藏取經，白馬寺，諫迎佛骨等大量的佛學典故，竭力要證明「佛教是唐朝才傳入我國」是不移之真理。這和電視台旁白中的「周朝佛像」相較，簡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，錯得更加離譜。

我雖未讀過佛教史，而且又是個無神論者，對佛學的認識，連皮毛也談不上，但我以爲稍有點中國歷史常識的人，一定會知道遠在唐代之前，佛教就早已傳入我國了。

佛教何時才傳入中國？這一直是個在學術界有爭議的問題。有些學者認爲：在秦始皇時，已有佛徒來中國傳教了。他們的理論根據，來自歷代三寶記卷一引朱士行經錄：「秦始皇時，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，費經來咸陽，始皇投之於獄」。此經錄之真實性如何，很有疑問。但據梁任公考證，天竺之阿育王與秦始皇同時，阿育王爲大弘佛法，曾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到外國四出傳教，這些僧徒在亞洲之足跡，北至俄屬土耳其，南至緬甸，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，這些傳教師來中國並非不可能之事。

到了漢朝，漢武帝通西域，外國的音樂、文化、藝術，隨着使團和商隊，大量地流入中國。作爲上層建築的佛學，在此時傳

入中國，也極有可能。

佛學被中國人接受的真正經得起推敲的證據，見於魏畧西戎傳：「（漢）哀帝元壽元年（公元前二年）博士弟子景盧，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。」有關這一點的同樣記載，亦見於正史魏書釋老志，稍有不同之處，是伊存授經者為秦景憲，不是景盧。人名雖不同，其事則一。梁任公推翻了釋老志中的漢明求法說及四十二章經說，但亦不能不承認伊存授經之事，是歷史的孤證。

由此可見，在西漢末，佛教已與中國人發生關係了。

佛教在中國統治階級內流行的證據，最早見於後漢書光武十王傳「（楚王）英少時好游俠，交通賓客，晚節更喜黃老，學為浮圖齋戒祭祀。（永平）八年（公元六五年），詔天下死罪皆入縑贖……詔報曰：『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江祀，絜齋三月，與神為誓，何嫌何疑，當有悔吝？其還贖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』因以班示諸國中傳。」

楚王英是光武帝的兒子。連王子也信佛，顯見當時佛教在中國已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力。漢明帝給楚王英的詔書，竟引用了很多佛教的名詞術語，如浮屠即佛陀，桑門即沙門，伊蒲塞即優婆塞之轉音，並對楚王英崇佛的行為大加褒獎，詔示各王，以為楷模。可見當時朝廷對佛教是提倡的。

佛教的神祇侵入皇宮，見於後漢書郎顛襄楷列傳載漢桓帝延壽七年（公元一六四年）襄楷疏：「又聞宮中立黃老，浮屠之祠。此道清虛，貴尚無為，好生惡殺，省慾去奢。今陛下嗜欲不去，殺伐過理，既乖其道，豈獲其祚哉！」

襄楷疏反映了兩個問題：（一）漢桓帝在宮中立佛祠，頂禮膜拜；（二）襄楷等卿士大夫，已對佛理有相當造詣，故能針對漢桓帝禮佛求祚的心理，因勢導利，進行諷諫。

佛教在我國思想界第一次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，是在魏晉時期。大抵因為漢季之亂，繼以五胡亂華，百多年來，中華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浩劫。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，自然盼望真能有救苦救難的東來菩薩。帝王將相在此翻雲覆雨之際，深感人命危

難，朝不保夕之苦，更易於接受佛教和因果輪迴之說。而且當時魏晉南北朝所盛行之清淡玄學的思想，與佛家般若學，在某些地方是比較相應的，當代的名士名僧思想彼此亦相互影響，互相吸收，因而被民衆和統治者樂於接受，迅速在當時的思想界傳播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新興力量。

佛教的大盛是在南北朝時。北朝雖經北魏太武帝毀法，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摧殘。但不久即由文成帝復興之，其後獻文帝、孝文帝，以及宣武帝都崇奉佛教，到了胡太后秉政時，已發展到「遍國皆寺，盡人皆僧」的驚人興盛田地。

至於南朝諸帝，亦大多崇佛。宋明帝大興土木，立湘宮寺。佛教皇帝——梁武帝屢設四部無遮會講經，及先後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僧的壯舉，更是國人喜聞樂道的佛教掌故。唐人杜牧之江南春絕句，就是諷南朝大興土木，建廟宇，崇佛教，以致亡國的。茲抄其詩為證：「千里鶯啼綠映紅，水村山國酒旗風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臺煙雨中。」

隋朝是佛教極盛的時代。隋文帝為寺院寫經四十六藏，凡十三萬卷，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，二萬九千餘部。民間流通的佛經，竟比儒經多數十百倍。

唐朝是佛教最光輝燦爛的黃金時代，但同時亦是佛教走向沒落和式微的開始。唐以後，儒者用中國經學揉合佛教義理，自立門戶，形成統治當時思想界的宋明理學。佛教因無法與宋明理學抗衡，已在中國知識界中愈來愈失去它原有的影響力。所以，佛教到了唐朝，已成了西天的夕陽，返照的迴光。套一句紅樓夢的籤文，已是「開到荼蘼花事了」了。

陳非先生要是捨周朝佛像而談鶴鶴鬆，是決不會把朝陽當夕陽，把迴光作曙光，把茶花當梅花，把佛教的傳入中國的朝代誤為唐的。因為「佛教之事先於『唐』太遠太遠了」。懇請陳非先生，今後還是多談些食的格調，少談些佛的格律。